



敦煌：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 张丹丹

“敦煌我一直是向往的”——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来自甘肃的全国人大代表邀请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看看，总书记这样回应。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首站就来到敦煌，在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等工作，对传承弘扬敦煌文化、加强敦煌学研究、推动敦煌文化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等提出殷切希望。

莫高窟守护人：择一事、终一生

敦煌历来就是联接西域和中原的战略要地。“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南朝梁史学家刘昭曾这样概括敦煌的经典特征。敦煌文化延续一千多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2016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贺信中指出：“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

莫高窟是东西方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见证。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始建于公元366年，连续建造一千多年，经历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等朝代，一直到元代才停止开窟。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圣地，目前在1700米长的断崖上保存了735个洞窟，包括南北两区。此外，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公元4—11世纪初的50000多件文献和艺术品。这些瑰宝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强调，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地上地下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位列第二。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演变过程的实证，保护文

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文化根脉，这是社会责任，是国家责任，也是全人类的责任。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其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一流的保护，把莫高窟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守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让人类文明更加久远地传下去。

莫高窟守护人：择一事、终一生

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按照遴选条件规定，文化遗产只要达到六项标准中的一项，就可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项标准，莫高窟无疑是一处具有巨大价值的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莫高窟的保护和传承。一代又一代“莫高窟守护人”在茫茫戈壁践行着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敦煌莫高窟第一代守护人的代表人物是常书鸿，他被誉为“敦煌石窟保护神”，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他偶然发现了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被中国这座艺术宝库深深震撼，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祖国。常书鸿带领着第一代莫高窟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手抓保护，一手抓学术，清除了300多个洞窟的积沙，修建了1007米的土围墙，使莫高窟得到了初步的保护。第二代守护人的代表人物段文杰被誉为“敦煌学宗师”，他和同事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至今仍在沿用。第三代守护人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她扎根敦煌60年，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各洞窟的分期断代，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



莫高窟窟区

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敦煌研究队伍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8人，到现在发展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类齐全的千人团队，成为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在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古代壁画与土地保护科研基地。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研究，已经为我国古代史、经济、政治、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敦煌研究院还承担国内壁画修复、石窟寺及土遗址保护、文物数字化等项目140余项，力争把敦煌留给人类的珍贵文化印记，保存下来、传承下去、利用起来。

推动敦煌文化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推动开放合作、促进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敦煌莫高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合贯通的典范。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城市、居

民的进步和发展都有其原因可寻：人们在从事贸易沟通、思想沟通，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哲学、科学、语言和宗教方面，人们从交流中得到启发，得到拓展。”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这样写道。敦煌文化遗产体现了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共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敦煌学与丝绸之路历史和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重要的文化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敦煌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架设起了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促进了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为积极推进敦煌学研究国际化，敦煌研究院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敦煌学的重要研究基地和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就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贡献力量。敦煌研究院充分利用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举办多场专题论坛、主题展览以及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化敦煌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认识理解丝路文明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接1版）因此，发展资本市场具有内在的理论逻辑，既需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又需要着力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同时，强化市场规则，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金融市场，促进长期资本形成。健全法人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拓宽银行资本金补充渠道，做好产融风险隔离。

从金融功能的转型趋势看，中国要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必须推动金融的市场化改革，以完成金融业态的多样性和功能的多元化，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着力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法治化

金融法治和规则体系是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推动中国金融现代化、实现金融强国最重要的条件。金融强国下的现代金融一定是法治化的金融。

金融的基石是信用，其基于社会的信任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信任来自哪里？来自完善的法治。所以，我们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必须把法治的完善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法治建设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某种意义上甚至更重要。有些国家经济规模不是很大，但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原因就在于完善的法治和对规则的遵守。所以，信用或者信任是建设金融强国最重要的基础。

与法治化相匹配的是契约精神，契约是法治化的社会延伸。一个有序运行的文明社会，是靠契约精神来维系的。现代金融市场的运行基于契约精神，每个金融产品都是一种契约，所以必须遵守契约，兑现承诺。而契约精神是建立在透明度基础上的。公开透明是现代金融和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为什么“三公”原则之首是公开性，缘由就在于此。契约精神和透明度是法治化的衍生品，没有法治化，一切无从谈起。金融产品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化产品，充分的信息披露是交易的前提。基于此，现代金融监管的核心是法治。

金融强国目标的实现，从法治化、契约精神等方面对中国社会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我们必须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行。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为金融业发展保驾护航。

着力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和国际化

开放和国际化的目标是拓展金融资源配置和分散风险的边界，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在金融强国的实现过程中，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加强优质金融服务，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的国际化主要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需要和谐适度的外部环境。国际化意味着国际投资者的信任并愿意作为财富储备持有。所以，一个和谐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着力改善外部环境，营造人民币国际化的良好条件，这是重要的软环境。同时，增加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属性，发展人民币国际融资功能，支持境外人民币外汇市场建设，畅通人民币全球循环。二是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当前，我国与金融强国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所以，大幅度提高外部投资者占比是我国实现金融强国的一个重要措施。未来经过5年的努力或者到2030年，比较理想的情况是，这一比例逐步上升到15%—18%。这一目标的实现与人民币国际化密切相关，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外部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占比很难上升。另外，提高中国市场的投资回报、完善的法治环境、规范的制度设计，都是提高外部投资者在中国市场投资占比的重要条件。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中国资本市场离这个目标还有较大差距。金融强国对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要求很高。实现金融强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实现贸易强国要难得多。中国2001年12月加入WTO后，开启了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型。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的标志，意味着中国社会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只有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才能够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转型。中国金融也是如此。中国金融只有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一员，才能实现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转型。所以，开放和国际化是不可绕开的重要环节。

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是我们必须进行的改革，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实现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飞跃。

（作者系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东坡书院位于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东郊，旧称载酒堂，是苏轼谪居儋州时期讲学传道的遗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儋州是苏轼仕途中的最后一个谪居地，苏轼的三年儋州生活为海南的文化教育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儋州成为海南文化兴盛之地。正如古人所言“琼之有士始于儋，琼之士亦莫盛乎儋”。

（一）

海南位于中国最南部，由于远离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被称为“越郡外境”“南服荒陬”。自汉代始，有众多文人豪杰被流放到海南岛。曾官至唐朝宰相的李德裕在《贬崖州司户道中》写道：“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在古代众多被流放到海南岛的人中，苏轼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个。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人（今属四川眉山市）。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苏轼被贬至海南岛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刚到儋州时，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恶劣超过苏轼的预想，他曾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与生活环境艰苦相比，引起苏轼关注的是儋州教育文化的落后。由于与中原地带长期隔绝，海南教育文化发展相对迟滞。一日，苏轼到儋州一所古学舍游览，没有想到竟空无一人。在其所作的《和陶示周掾祖谢》中记载道：“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永愧虞仲

翔，弦歌沧海滨。”《三国志》记载：虞翻，字仲翔。徙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由此诗可见苏轼立志要成为像虞仲翔一样的人，即使生活环境艰苦，也要为儋州的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

元符元年（1098年），苏轼和军使张中同访黎子云，黎子云的住所前临大池，山林幽茂，小有藏书，“坐客欲为酹钱作屋”，苏东坡“欣然许之”，并取《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名其屋曰：载酒堂。载酒堂落成后便成为苏轼以文会友、传播中原文化的重要基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载酒堂改称“东坡书院”。

（二）

苏轼谪居儋州三年，续写完成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撰写文章160余篇，创作诗歌170余首。载酒堂作为苏轼讲学传道的基地，当时大批学子慕名纷纷来儋州拜东坡为师，如琼州的姜唐佐、崖州的裴闻义、江苏的葛延之等，儋州当地读书人如黎子云兄弟、符林、王霄等常“载酒问字”，以从师于东坡为傲。儋州因此成为海南文化兴盛之地。《重修<儋县志>叙》记载：“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



武 星

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

苏轼贬谪到海南岛之前，整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在苏轼的影响下，海南诞生了第一位举人姜唐佐和第一位进士符确。1099年，远在琼州的姜唐佐慕名来儋州求教于苏轼。苏轼因姜唐佐有中州士人之风，“甚重其才”，赠诗道：“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苏轼鼓励姜唐佐外出应试，相约“早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终究没有辜负苏轼的厚望，在苏轼获得赦免北归三年

后，中举乡贡，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东坡北归九年后，学生符确也考中进士，成为海南的首位进士。之后，海南人才辈出，至清光绪年间（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时，共出举人767名、进士97名。

关于苏轼对儋州教育事业的深远影响，古代文人学者多有记述。南宋名臣李光在《迁建儋州学记》中记载：“时人知教化，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明代海南进士唐胄撰写的《重建儋州儒学记》中记载：“琼之有士始于儋，琼之士亦莫盛乎儋”，真实再现了海南儋州当时鼎盛学风。清代戴肇辰等学者撰写的《琼台纪事

录》谈道：“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清代名士陈琅在《重修东坡书院有感》中感叹：“宋朝一日攻朋党，儋耳千秋得太师。”今天，东坡书院的这副楹联是对苏东坡儋州三年贡献的生动概括：灵秀毓峨眉，纵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

（三）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苏轼三年的儋州生活是其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南宋以后，众多文人墨客来儋州瞻仰东坡遗址，感受东坡遗风。明代成化年间，广东提学张习视察儋州，作诗道：“风土黎殊是海乡，鸟多鸚鵡果槟榔。我来踏遍珠崖路，要览东坡载酒堂。”表达了对儋州载酒堂的崇敬向往之情。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曾作《登载酒堂》道：“先生无地隐危身，天赐黎山活逐臣。万里鲸波隔希夷，千年桂酒吊灵均。忠贞塞得乾坤满，日月俱从文字新。底个短檐长帽子，青莲居士谪仙人。”

新中国成立后，众多文人学者曾

来东坡书院考察调研，留下纪念诗作。1962年，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考察东坡书院时在《儋耳行》中感叹：“俄而载酒亭前过，东坡笠屐正逡迤。”同年，著名戏剧家、国歌词作者田汉冒雨来寻东坡书院，作诗道：“东坡踪迹遍南疆，冒雨来寻载酒堂。三年野服多知己，万里天涯即故乡。丹荔玉肤犹未熟，新椰琼液已堪尝。诗魂更是掀须笑，十丈红花簇凤凰。”2001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来此寻访东坡踪迹，作诗道：“寄意天涯洒酒者，来拜儋州一真人。”

1996年，儋州东坡书院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建有载酒亭、载酒堂、东坡祠、东坡井、东坡像、东坡塘、陈列馆等景观建筑。书院众多的匾额、楹联、碑刻和字画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历史研究价值。儋州荣获了“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书法之乡”等称号。苏东坡的三年儋州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载酒堂的传道授业开风气之先，成为海南文化教育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时至今日，东坡书院已成为儋州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而东坡文化早已融入儋州人民生活的点滴日常。

